

A

香港理工大學

雙語跨學科中國研究(榮譽)文學士

2015-16 年度 · CC402 中國文化畢業習作

金庸小說《鹿鼎記》的政治隱喻

14040189D

梁志宏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指導老師

梁淑雯博士

目錄

頁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	1
第二節：研究範圍及方法	1
第三節：論文章節	2

第二章：《鹿鼎記》研究文獻綜述

第一節：前言	2
第二節：文獻綜述	2-4
第三節：小結	4-5

第三章：金庸與《明報》

第一節：《明報》的成立	5
第二節：《明報》的定立	6-8
第三節：在《明報》連載的金庸小說	8-10
第四節：金庸小說的政治性	10-11

第四章：金庸看文化大革命

11-15

第五章：《鹿鼎記》的政治隱喻

15-20

第六章：結論

20-21

參考資料

22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

《鹿鼎記》於 1969 年 10 月 24 日開始在《明報》連載，在 1972 年 9 月 23 日完成，歷時約三年。一如既往，小說的人物形象、歷史意識、敘事結構或悲喜劇藝術都成為學者的研究和討論觀點，然而，大多的研究都忽略《鹿鼎記》的載體——《明報》。金庸在訪問中提到：「只能夠一日寫一段，大約構思一個鐘頭，寫一個鐘頭，一日寫一千字左右。」¹，同時，金庸亦在《明報》刊登專欄。倘若《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便能真正理解金庸的抱負與情懷。¹而過往的學者，只是集中於剖析《鹿鼎記》的內容，如人物、情節等，並未有就與《鹿鼎記》同時刊登的政論專欄作研究。

本文研究目的是將金庸在《明報》連載的《鹿鼎記》與刊登的政論文章作比對，從小說《鹿鼎記》中，剖析金庸的政治隱喻。而處理的問題是，經過小說與政論文章的比較，金庸在創作《鹿鼎記》時，如何根據當時的政治氣氛，而續寫小說。

第二節：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文將蒐集一手資料，直接抄錄 1969 年 10 月 24 日至 1972 年 9 月 23 日《明報》的《鹿鼎記》內容和政論文章。而本文研究對象為上述所列舉時間的刊登內容，由於論文篇幅所限，金庸其餘小說和政論文章不是本文所研究的對象。

本文將採用非實驗性方法——文獻研究法。從上述時間的《明報》中，抽取《鹿鼎記》的內容和《明報》的社評，第一手資料的文本進行互讀，繼而分析《鹿鼎記》中的政治隱喻。其次，選用二手資料，搜集當時金庸連載《鹿鼎記》和撰作社評時，金庸所面對的政治環境和發生的事情，例如文化大革命。將社評、小說和歷史資料作一個文本對讀。

¹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216。

第三節：論文章節

論文將分為六章，起首以兩章交代論文研究細節和文獻綜述。第三章先說明金庸與《明報》的關係以及《明報》與金庸小說的關係，使讀者能夠理解《明報》在轉型的過程中，金庸小說也跟隨轉型，從而使《鹿鼎記》含有金庸的個人政治意見。第四章先透過金庸在《明報》撰寫的社評，分析金庸的政治立場和意見。第五章是細讀《鹿鼎記》的人物、情節如何與當時金庸所面對的政治環境有關，從而使金庸將個人的政治意見成為創作《鹿鼎記》的一部分靈感來源。最後一章則是本篇論文的結論。

第二章：《鹿鼎記》研究文獻綜述

第一節：前言

《鹿鼎記》於 1972 年 9 月 23 日在《明報》完成刊載，此後與金庸其他小說皆成為俗文學的研究對象。比較普遍研究的方向可分為四類，分別是人物形象、文學欣賞、女性意識、版本研究。另外，曾有不少的學者談及《鹿鼎記》有金庸政治影射的色彩，卻研究的論文、專著卻寥寥可數，而且未能仔細解釋金庸如何將個人政治意見滲入小說情節當中。本節將以概括的方式，綜述各類研究金庸小說的專著。

第二節：文獻綜述

在人物形象方面，研究《鹿鼎記》的人物主要是韋小寶。在一般的設計下，武俠小說的主角最終也是武功高強，受到武林或民間的熱愛，例如是《神雕俠侶》的楊過或《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可是，韋小寶不學無術、武功不濟，卻受到皇帝康熙的喜愛，最高的官職是「鹿鼎公」。這可說是「勵志故事」，故此，研究文獻從韋小寶的人物性格，考究韋小寶的成功之道，例如《金庸小說的男子》指出韋小寶的成功因素，是來自他的性格：「包括潑皮無賴、不怕闖、貪心、精靈、

懂得作弊、花錢、奉承、虛偽。」²另外，《雜論金庸》以韋小寶在情節所顯示的「義氣」和「官威」，³分析韋小寶的成功之道。除此之外，也有為韋小寶「小人」的性格平反，例如《話說金庸》指出：「韋小寶絕不是英雄，但說他是好漢、是豪傑也不會怎樣錯。」⁴書中為韋小寶負面的形象辯護，例如是有人認為韋小寶無賴，作者認為韋小寶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為了存活，不得不耍無賴。

在文學欣賞方面，金庸在《鹿鼎記》後記說：「《鹿鼎記》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複自己的風格形式，要盡可能的嘗試一些新的創新。」⁵由此可見，金庸在創作《鹿鼎記》時，摒棄以前十四部小說的創作概念，而這個創新的意念，主要呈現在韋小寶與康熙的搭配當中。例如《文學金庸》從《鹿鼎記》的寫實程度分析小說，指出：「小說的整個第一回的人物與故事，都是『有案可查』的。其中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等人物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⁶《文學金庸》指出作者將虛構的人物韋小寶，設置於真實的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不能否定韋小寶這一類人物的真實存在。金庸把韋小寶與歷史的虛實敘述，成為「藝術真實」⁷。

在女性意識方面，金庸過往的作品中，不乏女權抬頭的意識，例如《射雕英雄傳》的黃蓉，黃蓉計謀多端，在郭靖身邊保護大宋江山而出謀劃策，另外，也有李莫愁在封建的社會，為愛而拋棄世俗的枷鎖。可是，在《鹿鼎記》中，金庸一反常態，韋小寶一人共有七位夫人，建寧公主、雙兒、阿柯等等，使女性回復本來的「從夫」形象，在〈月明林下美人來——淺談金庸小說中的女性世界〉形容：「散發著強烈的反諷意味。被稱作是『對愛情童話的消解』」。⁸另外，〈金庸的悖論：傳統男權尺度與現代女性觀〉也指出：「各類女性怎樣被韋小寶佔有的

²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香港：名窗出版社，1989），頁 62。

³ 潘國森，《雜論金庸》（香港：名窗出版社，1995），頁 54-86。

⁴ 潘國森，《話說金庸》（香港：名窗出版社，1998），頁 43。

⁵ 金庸，《鹿鼎記》（廣州：廣州出版社，2007），頁 1959。

⁶ 陳墨，《文學金庸》（臺北：雲龍出版社，1997），頁 180。

⁷ 陳墨，《文學金庸》，頁 180。

⁸ 咎馨，〈月明林下美人來——淺談金庸小說中的女性世界〉，《山東文學》，期 12(2007 年)，頁 40。

過程，而對女性本身的評判意識有所減弱。」⁹

在版本研究方面，金庸在十五部小說連載結束後，全面修改其所創作的武俠小說，其後陸續有修訂版本的金庸小說推出市場。故此，有學者以報刊連載的版本和新修訂的版本作前後期的對比，例如〈金庸《鹿鼎記》新舊版本研究〉中，分文辭、情節及人物三部份，評論《鹿鼎記》修訂的得與失。¹⁰

在政治隱喻方面，雖然有不少學者，例如嚴家炎、柳芳、陳平原或孔慶東等人，都曾說明或認為金庸的晚期武俠小說滲透金庸個人對中國共產黨或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可惜，都只是作出初步的討論或表述，未有進行深入的研究。然而，香港科技大學陳素雯的碩士論文〈金庸武俠小說連載本(1962-1972)與文化大革命〉¹¹是少數較為能夠將《明報》與《鹿鼎記》作關聯的研究，陳素雯的論文更透過《明報月刊》輔以研究金庸的政治影射。論文前部分是研究金庸報刊的內容、立場、背景，十分深入和仔細，而後部分是分析《笑傲江湖》和《鹿鼎記》的諷喻，此部分的研究較為粗略描述金庸的政治投射，沒有細讀小說內容與政論文章的內容，例如在指出某處的內容與文化大革命相關，論文只是直接導出結果認為是與政治有關，卻沒有深入解釋如何諷喻。

第三節：小結

從上述的研究類型可見，學者主要剖析小說的內在元素，研究小說所帶來可讀性的原因，無論在人物形象、文學欣賞、女性意識或版本研究，前人都已經有深入的研究。而鮮有學者從政治隱喻作深入的分析，本篇論文則從陳素雯的論文後部分不足的地方作出深入研究，透過第一手資料《明報》社評和《鹿鼎記》作出文本對讀，細讀金庸如何在《明報》社評直接表達個人政治意見，另外在小說《鹿鼎記》所隱喻政治的意見。筆者認為《鹿鼎記》的研究方向可從小說的載體

⁹ 丁莉麗，〈金庸的悖論：傳統男權尺度與現代女性觀〉，《浙江學刊》，期 5(1997 年)，頁 89。

¹⁰ 盧乃鳳，〈金庸《鹿鼎記》新舊版本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9），頁 166。

¹¹ 陳素雯，〈金庸武俠小說連載本(1962-1972)與文化大革命〉（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論文，2007），頁 1-166。

入手，以金庸同一天刊載的政論文章與小說內容做比對，再配合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政治事件，研究金庸在小說中所暗示或投射的政治意見。

第三章：金庸與《明報》

第一節：《明報》的成立

金庸於 1959 年 5 月 20 日，與其初中同學沈寶新先生創立《明報》。¹²金庸創立《明報》也非偶然的機會。首先，金庸曾於《大公報》報館工作，熟悉報館的運作，而他的初中同學沈寶新在嘉華印刷廠當經理，充分了解印刷廠的操作。¹³一個懂寫作，一個懂印刷，兩人是一文一武的配合，為創立《明報》的理想打下基礎。其次，金庸在創立《明報》之前，已經在《新晚報》、《香港商報》刊登自己的小說作品，例如是《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和《射鵰英雄傳》，¹⁴根據《香港商報》當時的調查顯示，屬於金庸小說的讀者至少有三萬，¹⁵由此可見，金庸的讀者是能夠作為金庸辦《明報》後的穩定收入來源。另外，根據張圭陽提出六十年代「同仁報」¹⁶的成本與收入的估計，成本每天大概是 833 元，以每天銷售 10,000 份，而每份的價格為 1 毫，則每天共有 1000 元的收入，每天的利潤達 167 元，一個月便有 5010 元，相對當時的工資水平，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¹⁷以《射鵰英雄傳》的讀者數量來計算，金庸若辦《明報》，每天的利潤為 501 元，而每月的利潤高達 15,030 元，是一筆龐大的收益。《明報》成立的原因，是有備而來，金庸有創業的志向及能力，而其同學沈寶新有充足的社會經驗，加上憑藉金庸小說的讀者帶來可觀且穩定的收入，使金庸與沈寶新決定創辦《明報》。

¹² 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1），頁 80。

¹³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頁 41。

¹⁴ 陳素雯，《金庸武俠小說連載本(1962-1972)與文化大革命》，頁 13。

¹⁵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41。

¹⁶ 「同仁報」，據張圭陽先生於《金庸與報業》的解釋為二數報社同仁集資自行辦報，以小報的形式來經營運作。見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19。

¹⁷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22-23。

第二節：《明報》的定位

由於本篇論文探討的對象是 1972 年 9 月 23 日在《明報》完成連載的《鹿鼎記》小說。故此，本節分析的《明報》定位處於發刊首日至《鹿鼎記》小說連載完畢。

1959 年的香港報業發展十分成熟，單以日報計算，便有《大公報》、《文匯報》、《商報》、《晶報》、《香港時報》、《工商日報》、《成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以及《南華早報》等。¹⁸而上述報章的立場都以的左、右、中區分，是一個相對性質的分野。《明報》駐足報業，亦非易事，能否於報業中獨佔鰲頭，則需考慮《明報》的政治立場以及報章內容。

《明報》的前身是《野馬》，《野馬》是一份雜誌而非報刊，因此，金庸和沈寶新當初計劃投資是一、二萬，金庸佔八成、沈寶新佔兩成，及後，改出報刊，金庸投資三萬，而沈寶新投資兩萬，這五萬元的投資在三、四個月內花光，金庸再投資五萬。可惜，在第一年，金庸和沈寶新總共投資的十萬已經花光，後來金庸向前公司《大公報》的同事郭煒文招股，郭煒文出資一千五百元成為《明報》第三位股東。1961 年，《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逼郭煒文退股，金庸連本帶利還給郭煒文兩萬元，《明報》一直維持兩位股東到 1991 年上市為止。¹⁹由《明報》的資金來源分析《明報》的立場可見，沈寶新之前是印刷公司的經理，可說是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主要是佔有八成股份的金庸，金庸曾在《大公報》工作，而在《明報》陷入資金危機之時，向前公司同事借錢挽救《明報》，雖然當時有人質疑郭煒文的資金來源是新華社，雖然《明報》並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然而只從金庸向《大公報》的同事借錢一事，《明報》的辦報立場是與左派報刊，表示友好。

《明報》在〈發刊詞〉說明辦報宗旨為「公正、善良、活潑、美麗」，並且提到「我們決心要成為你一個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說說故事、講講笑話，討論

¹⁸ 傅國涌，《金庸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頁 164。

¹⁹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51-52。

一下問題，但有時候，也向你作一些溫文的勸告」。²⁰從《明報》的〈發刊詞〉可見，《明報》在創刊的時候，沒有政治的成份。這是由於創刊初期的《明報》是一份四開的報紙，頭版的內容是刊登社會性趣味的特稿，第二、三版是刊登金庸的連載小說或其他小說作品，第四版則是雜文、小說。整份報紙並沒有新聞報導，以金庸其個人的小說作為「賣點」，而銷售對象亦是小說的讀者為主，屬於娛樂性質的報紙。

即使《明報》在 1959 年 6 月 6 日，金庸撰寫社評《我們的立場》提到：「我們擁護『公正與善良』。這五個字，就可以說是我們的立場。」²¹但是，《明報》創刊的初期並不重視評論，即使偶有社章，然而所評論的內容並不涉及分出「左派」或「右派」的氣息，而且報紙內容的性質以「文學」或「休閒」內容為主，所以《明報》先以「中立」的角色在報界生存。

金庸把《明報》的發展，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一是 1962 年的難民潮，二是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²²由於中國「大躍進」政策，引發難民潮，當時的左派報章因為政治立場取態，凡是損害共產黨利益或名聲的消息，都以低調的方式處理。《明報》在發生難民潮事件前，仍然走「非政治」的路線，與左右兩派報章表示友好。然而在事件發生後，金庸受到當時環境的壓力，即《明報》其他編輯的壓逼，要求報導難民潮事件；以及個人內心的「人道」考驗。金庸決定將難民潮事件毫無保留的將之呈現在《明報》上，並且開始對中國政策作出評論。金庸在決定報導難民潮的消息後，知道這個行為無疑是與中央和左派報章表示「道不同，不相為謀」。及後在《明報》發表一篇〈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²³的社

²⁰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62。

²¹ 傅國涌，《金庸傳》，頁 164。

²²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93。

²³ 〈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明報》（香港），1964 年 12 月 8 日。收錄於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108-109。節錄內文：「……當大陸上飢餓的同胞在五月初開始湧向香港時，我們為了興全中共的面子，不願多惹是非，所以並不登載這些消息。後來飢民愈來愈多了，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只好刊登一些。……在受到事實和良心的嚴重的考驗之時，我們只有決定，『真實地報道這個不幸的消息，發表這成千成萬同胞們的苦難。』我們明知這會得罪許多朋友，會使得我們以後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會使我們負上許許多多的罪名。然而，《明報》刊登過許多武俠小說，我們讚揚堅持正義的心靈，難道在說了許多年風涼話之後，當自己遇到危機的時候，就去做卑鄙無恥的小人麼？……金庸出身於《大公報》，自然深知你們對付異己的態度。……在作這個決定

評，社評提到金庸認為「難民潮」事件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顧全中國共產黨的面子和威信，使萬千同胞受苦，無法面對自己的良心和辦報的責任。而且金庸自己曾在報刊中連載大量的武俠小說，而在武俠小說當中，不難發現角色人物或多或少都注入「俠」、「義」的精神，而「俠」、「義」的精神是救助弱小，鼓勵社會、人民需要存有一顆正義的心靈。金庸出身《大公報》，亦自知《大公報》對付異己的手法，雖然金庸深知日後遭到報復，但他毅然以維護大眾社會的知情權、福祉為首要任務。

《明報》報導難民潮事件後，銷量突破三萬份的關口，更在 1962 年的下半年，上升至超過四萬份。²⁴雖然當時《明報》報導難民潮事件的標題，皆以「人性」和「人道」的立場出發，秉承辦報宗旨「公正與善良」。然而，《明報》即使多次表明其「中立」，卻仍然成為香港左派報章的敵人。同時，因為難民潮事件，金庸已經形成了他對中國國內政局的看法，他在這個時候寫作的〈讀史隨筆〉，也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諷喻意義。²⁵《明報》由一份娛樂性質的報章，走向評論時事，報導政治的報章。

第三節：在《明報》連載的金庸小說

金庸武俠小說影響學術、藝術等各個界別超過半個世紀，影響超然。然而在《明報》初期中的金庸小說，卻沒有如斯重要的地位。金庸在訪問中提到：「我寫小說實際上當時的一種副業，我主要是辦報紙。報紙要吸引讀者，那麼我寫小說增加點讀者。」²⁶初期的《明報》沒有報導新聞，也沒有「過火」的評論，更沒有靠攏任何一個派別，走中間的路線。雖然，根據《香港商報》當時的調查顯示，屬於金庸小說的讀者至少有三萬，可惜，《明報》初期的銷售量並不理想。

之時，我們已隱隱感覺到，不久將來，等這次事件平靜之後，左派的宣傳者便會借故來向我們進攻了。」

²⁴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414。

²⁵ 陳素雯，〈金庸武俠小說連載本(1962-1972)與文化大革命〉，頁 10。

²⁶ 金庸著，江堤、楊暈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 18。

首日印刷 8,000 份，卻沒有全部售出。²⁷可見，金庸小說在《明報》初期的功能是吸引讀者，保證報紙的銷售量。

然而，1962 年的難民潮事件後，小說的銷售量上升的原因卻是《明報》敢言的作風，使民間不必蒙在鼓裡，得到市民的支持和追捧，使其銷售量超過 40,000²⁸。金庸形容難民潮是《明報》其中一個轉捩點，而在《明報》改變的時候，《明報》的金庸小說也開始作出改變。陳素雯指出：「六十年代開始，香港政治文化受到內地的政治運動衝擊，先是移民潮、核試，再而文化大革命。在這些社會氣候下，金庸小說言志、諷喻意識愈為突出，並形成了《笑傲江湖》、《鹿鼎記》這兩部風格與金庸前、中期作品迥然不同的小說。」²⁹《明報》因難民潮事件，金庸作出的決定，而進行改革，由消閒、娛樂性質改由報導時事、新聞，以及附以評論，而小說的功能亦因此作出改革，由吸引讀者轉化成「有所指的抒發」。金庸即使與左派報章在報導新聞時有不同的意見，卻非故意與左派抗衡，所以金庸其後以「華小民」署名作評論。而小說能夠成為金庸的第二個抒發政見的地方，如羅立群提到：「金庸武俠小說是受到作者身處的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並不斷地順應社會思潮而創作，並反映了該時期的民族心態或思想。」³⁰金庸的章回小說屬於通俗小說的類別，而通俗小說的關鍵之處在於「俗」，是貼近民間、讀者周遭發生的事，即是作家在某個社會氛圍下創作，其作品受該社會氣氛影響，而該社會同時受該作品影響，這是小說作品與社會互相影響下的回饋作用。例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郭靖，所代表的意識是忠於國家，或派別當中的尊稱，所代表是儒家文化的尊師重道，這都是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如羅立群提到：「在各類小說題材中，只有武俠小說永遠保持著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甚至保留了最完整的中國文化形態。」³¹金庸前、中期的小說內容多以俠義、忠孝等中國傳統觀念作為中心思想，能夠與中國民間的社會、讀者引起共鳴。而上述「有所

²⁷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414。

²⁸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 414。

²⁹ 陳素雯，〈金庸武俠小說連載本(1962-1972)與文化大革命〉，頁 2。

³⁰ 羅立群，《談劍錄》(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頁 5。

³¹ 羅立群，《談劍錄》，頁 3。

指的抒發」是指金庸後期小說的內容轉型。在金庸開始撰寫評論文章後，其小說內容也開始滲入他個人的政治意見，小說的功能亦由取悅讀者轉變成抒發政見。

第四節：金庸小說的政治性

金庸晚期小說功能的改變，是因為金庸一方面撰寫評論時事、新聞的文章，另一方面，繼續創作武俠小說，陳平原形容為：「左手政論，右手小說。」³²這樣邊創作邊寫作的影響下，以致金庸小說的字裡行間出現政治的意識，而陳平原認為：「使武俠小說家金庸一改『邊緣』姿態，在某程度上介入了現實政治與思想文化進程。」³³除此之外，不少學者認為金庸的小說滲透了其個人的政治取態。例如，嚴家炎提到：「『文革』初期，林彪、『四人幫』的氣焰如日中天，個人迷信極其盛行，敢於在那樣的年代，通過小說對這類現象在以諷喻，這需要多麼超卓的膽識！」³⁴、陳平原提到：「只要對當代中國政治略有了解，都會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中讀出強烈的『寓言』意識。」³⁵和蔡翔均提到：「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其對當時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射。不僅是教內的一些政治活動，甚至直接搬用了當時大陸的流行政治術語，而其直接的體驗，可以猜想是由於香港『六七暴動』的左派對金庸個人強烈的刺激。」³⁶由此可見，不少學者均認為金庸晚期武俠小說中，抱有個人的政治色彩，能夠說明金庸小說的類型處於轉型的狀態中。而陳平原認為：「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³⁷《明報》的風格自1962年的難民潮改變，成為「敢言」的媒體，期後更大肆評論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推行，而《鹿鼎記》更是文化大革命年代下的產物，故此，將金庸在《明報》撰寫的社論與《鹿鼎記》作一對照，能夠理解金庸如何將個人政治意見轉化為小

³²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頁214。

³³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頁214。

³⁴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1999)，頁210。

³⁵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頁215。

³⁶ 林麗君編輯，《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香港：明河社，2000)，頁424。

³⁷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頁216。

說的情節、文字。

第四章：金庸看文化大革命

金庸首次關注文化大革命的事態，可見於他在《明報》社評刊登一篇名為〈彭真頭痛矣〉³⁸的評論文章。在1965年11月，毛澤東秘密透過姚文文發表一篇批評由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新編劇《海瑞罷官》，及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相繼下台。³⁹這篇社評反映金庸關注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風波，同時反映金庸對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敏感程度，以致後來金庸一直對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有所體會，同時在《明報》社評中表達個人政治意見。在金庸開始寫作《鹿鼎記》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已超過三年，在大勢已定的情況下，金庸不畏左派報章的攻擊，依然在《明報》社評中表達個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意見。而且從金庸的社評中，我們不難發現金庸對文化大革命，甚至對毛澤東的不滿。

首先，金庸多次在《明報》社評中抨擊文化大革命讓中國與其他大國樹敵的情況。例如他在〈既做工夫，亦嘆世界？〉⁴⁰指出由於極左派的行為，使中國在國內國外，都是樹敵和碰壁，金庸認為極左派的意見，是無助中國的穩健發展。而且在同一篇社評中，金庸認為中國共產黨終於覺醒，舊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而通過修正，終於能夠使中國走向正確的途徑。⁴¹另外，金庸多次在社評中認為經過三年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終於「正常化」，例如〈大勢所趨是和平安定〉⁴²、〈中共態度漸趨溫和〉⁴³、〈中共穩健派何以佔上風？〉⁴⁴，

³⁸ 〈彭真頭痛矣〉，《明報》（香港），1966年5月12日，第1版。

³⁹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802-803。

⁴⁰ 〈既做工夫，亦嘆世界？〉，《明報》（香港），1969年11月11日，第1版。節錄內文：「極左派的所作所為，不論在國內國外，都是處處樹敵，事事碰壁，非常明顯，那樣的政策是決計行不通的。」

⁴¹ 〈既做工夫，亦嘆世界？〉，第1版。節錄內文：「中共當局開始認識到，要群眾一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顧老百姓的物質生活，這條路終究是行不通的。……這個修正，當然是走向正確途徑的一步。」

⁴² 〈大勢所趨是和平安定〉，《明報》（香港），1969年12月18日，第1版。節錄內文：「中共的外交政策在過去半年內逐步正常轉為正常化，由於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元氣大傷，中共需要一段極長的時間來休養生息。……中共是這樣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經過這樣一場『越亂越好』的大亂之後，用十年時間來修整，不說是最低限度的了，那還是假定不再有新的動亂而言。」

⁴³ 〈中共態度漸趨溫和〉，《明報》（香港），1969年12月19日，第1版。節錄內文：「三名英軍

或〈文化藝術 照破不誤〉⁴⁵，部分社評更指出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元氣大傷，不是良性的革命，「越亂越好」的大亂，認為是一場國家動亂，無助國家的發展。

其次，金庸在社評指出文化大革命為國家帶來的動亂，並不是帶有建設性的破壞，是惡意的破壞，使國家黨組織無法團結，人民失去信心，而這樣的破壞是源自中國共產黨內的個人、集體權力鬥爭的惡果。例如金庸分別在《明報》社評〈中共和南斯拉夫修好〉⁴⁶、〈和平安定的七十年代〉⁴⁷、〈中共穩健派何以佔上風？〉⁴⁸及〈由槍桿子來整黨建黨〉⁴⁹都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權力鬥爭的遊戲，而帶來的破壞需要十年重建。另外，金庸認為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失去當年與國民黨抗衡的「統一戰線」策略，文化大革命對四個階級，分別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都是「大整而特整」，而「統一戰線早已崩潰」⁵⁰，而且倘若再面對國外的戰爭，人民可能無法像國共內戰時，懷有那種必勝的信心。

和一個女郎駕遊艇出遊，誤入中共海域而遭扣留，只過兩天便獲釋放。……這件事若是發生在兩年之前，相信被扣的四人決無如此幸運。……中共已發覺以前視全世界為敵人的「紅衛兵外交」是行不通的，樹敵太多，畢竟是自己吃虧。」

⁴⁴ 〈中共穩健派何以佔上風？〉，《明報》（香港），1970年2月1日，第1版。節錄內文：「過去一年來，中共在內政和外交各方面，大致上走的是比較正常和穩健的路線。」

⁴⁵ 〈文化藝術 照破不誤〉，《明報》（香港），1970年2月22日，第1版。節錄內文：「中共最近一件來，在經濟政策和外交上，都採取了比較穩健的措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橫衝直撞的行徑大不相同，因之在國內國外相對的得到了安定。」

⁴⁶ 〈中共和南斯拉夫修好〉，《明報》（香港），1969年12月8日，第1版。節錄內文：「所以我們一直認為，中共和蘇聯的鬥爭，既不是民族主義的衝突，也不是出於思想上的矛盾，根本便是雙方領導層的權力鬥爭。」

⁴⁷ 〈和平安定的七十年代〉，《明報》（香港），1969年12月17日，第1版。節錄內文：「共產黨的理論家以往總是說，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將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斯大林逝世之前不久，就曾預言說，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例如美國和德國，或者法國與英國之間，有發生大戰的重大可能。在現在看來，這種預言已變得非常的可笑。……中共當然會繼續唱反調，但我們不相信這種反調能唱到十年之久，如果這七個大國之間沒有重大矛盾，中共極少可能會和這七個個國家的集團進行軍事對抗。在這樣情形下，中共的思想戰、宣傳戰雖然仍將進行，但決不致於發展為大規模的戰事，中共今後將集中力量來從事內部的建設和鎮壓內部的叛亂。」

⁴⁸ 〈中共穩健派何以佔上風？〉，《明報》（香港），1970年2月1日，第1版。節錄內文：「江青所領導的極左派份子，曾和林彪的軍人系統進行過長期而激烈的權力鬥爭……毛澤東所謂剩將餘勇追殘寇，定要將對方鬥倒、鬥垮、鬥臭……經過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的內部權力鬥爭後，中共黨組織全部崩潰，從中央而至地方，到處亂成一團，如果中國真是天下，那的確是天下大亂了。」

⁴⁹ 〈由槍桿子來整黨建黨〉，《明報》（香港），1970年3月10日，第1版。節錄內文：「文化大革命是造反和奪權，造反是造黨之反，奪權是奪黨之權。」

⁵⁰ 〈毛澤東的三件法寶〉，《明報》（香港），1970年1月12日，第1版。節錄內文：「但二十年來，中共通過一連串的運動、鬥爭、清算、造反，對四個階級的成員大整而特整，這條統一戰線早已崩潰了。三反五反運動是將民族資產階級劃作了敵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將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劃作了敵人；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取消了農民分到手的田地，失卻了農民的擁護；文化大革命整勢了大量黨幹部，反經濟主義又使工人階級離心。……何況經過文化大革命後，健全的黨組織尚未建立，軍隊內部派系分裂，各地革命委員會內部的爭權鬥爭迄未解決。」

⁵¹這些社評都可以觀察金庸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痛恨和不滿，而且他認為文化大革命除了使國家陷入動亂，使人民陷人民不聊生的生活中，更是指摘毛澤東等人在文化大革命爭權奪利中，卻無法一致獲得人民或共產黨的支持，例如在〈中蘇大戰，有何目的？〉⁵²社評中，金庸指出毛澤東和林彪自己也承認的事實，是大興文化大革命，卻未能獲得全國、全黨的一致支持。

除此之外，金庸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之情，於《明報》社評中，顯而易見。首先，金庸認為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習慣「口號式」的行動，例如，在〈既做工夫，亦嘆世界？〉⁵³社評中，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人民工作方案上的修正，是走向正確途徑的一步，因為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然而金庸憂心過不了多久，便會流於口號式的建議，而不能實踐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中。而且，金庸在〈中共大陸農產豐收〉指出中國共產黨依然強調口號，而中國的農業依然「靠天吃飯」。

⁵⁴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場爭奪權利的遊戲，為民所制定的政策，是流於表面形式或口號形式，以致在文化大革命後，這口號式的作風，依然保存。另外，金庸甚至在社評中，表達對毛澤東的不滿，同時反映他對毛澤東所推行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例如金庸在社評〈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貢獻〉⁵⁵暗諷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所認為的偉大是需要一場「革命大風暴」，而不是人民渴求的安穩和平的生活，而且金庸明確指出倘若毛澤東的壽命延長，他所認定的「偉大」是無法長

⁵¹ 〈現代化重武器的游擊戰〉，《明報》(香港)，1970年1月11日，第1版。節錄內文：「何況經過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鬥爭後，中共是否能得到人民和幹部的支持，問題很大，打人民戰爭必勝的信心，比之以前是大大減弱了。」

⁵² 〈中蘇大戰，有何目的？〉，《明報》(香港)，1970年1月17日，第1版。節錄內文：「毛林派並未得到舉國一致的支持，甚至也得不到全黨、全軍的一致支持，這是連毛澤東和林彪自己也承認的事實。」

⁵³ 〈既做工夫，亦嘆世界？〉，《明報》(香港)，1969年11月11日，第1版。節錄內文：「『鼓足幹勁』、『苦戰三年』、『挑燈夜戰』等等口號所掩沒了。」

⁵⁴ 〈中共大陸農產豐收〉，《明報》(香港)，1969年11月17日，第1版。節錄內文：「新華社電訊中並未提到全國大豐收後，全國人民（至少是全國農民）的生活有如何改善，仍是強調『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徹底革命精神』，關於全國農民的反應，只說：『億萬社員正踴躍地向國家交售豐收的糧、棉和其他農產品，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⁵⁵ 〈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貢獻〉，《明報》(香港)，1970年1月2日，第1版。節錄內文：「如果和平與繁榮是「偉大」，那麼七十年代將是很偉大的，只不過這種偉大恐怕免不了有一點兒沉悶和平淡，未必是中共所期待的那種「革命大風暴」的偉大。在今後十年之中，毛澤東即使仍是「萬壽無疆」，但積極而活躍的領導，相信總維持不到八十年代了。」

存久安。及後，在同一月份，刊登〈周恩來，願你健康！〉⁵⁶來加強表達對毛澤東的不滿。金庸認為周恩來自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一直以人民的福祉為前題，然而毛澤東卻「狂熱地任性而為」，所決定的政策，是違背人民希望和平安定、提高物質生活，和不要有這樣多殘酷的自相殘殺和鬥爭的願望。再者，金庸的社評〈非和非戰 備而不戰〉⁵⁷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對國家、社會結構的改造，訛稱「戰爭的威脅」，使國內民意消除分歧，統一對外，使其政權穩定，是在利用中國的人民。

金庸除了透過社評表達其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更曾寫過五則〈讀史隨筆〉表達對於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躍進」的不滿，這部分已有學者⁵⁸作深入的分析，所以在本篇論文中，不再提及。然而，雖然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三年之久，金庸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抱有埋怨，並在《明報》社評發表意見，金庸在社評中大多以直接的手法表達意見，亦有諷刺的手法，例如在〈印度執政黨的內部矛盾〉⁵⁹中，金庸先記述印度執政黨開除總理甘地夫人的黨籍，後加插一句「說不定還是從中共中央將國家主席劉少奇開除黨籍這件事中得到了靈感」，用以諷刺中國共產黨批鬥國家主席劉少奇一事。

總括而言，金庸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可見於他在《明報》撰寫的社評當中，金庸從文化大革命對國外、國內造成的負面破壞，進行批評及表示惋惜。從多篇的社評得出結果，金庸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等人在政治層面上，為個人利益、

⁵⁶ 〈周恩來，願你健康！〉，《明報》(香港)，1970年1月31日，第1版。節錄內文：「中共建國以來，周恩來一直是國務總理，但遇到了重大的轉折點，總是由毛澤東決定一切，而一切重大決定，幾乎毫無例外是對國定民不利。五反、韓戰、百花齊放與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在這些大事中，毛澤東總是狂熱地任性而為……但極大多數人民希望和平安定、提高物質生活，不要有這樣多殘酷的自相殘殺和鬥爭。」

⁵⁷ 〈非和非戰 備而不戰〉，《明報》(香港)，1969年12月5日，第1版。節錄內文：「因此對於中共，備戰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對外是防備蘇聯的侵犯，對內是加強統治，鞏固政權，提高槍桿子彈的地位。……中共所要的是『備』，而不是『戰』，需要的是『戰爭的威脅』，而不是真正的戰爭，也不是真正的和平。」

⁵⁸ 金庸的五則〈讀史隨筆〉分析，請閱讀陳素雯，〈金庸武俠小說連載本(1962-1972)與文化大革命〉，頁23-28。

⁵⁹ 〈印度執政黨的內部矛盾〉，《明報》(香港)，1969年11月14日，第1版。節錄內文：「黨的工作委員會竟然將總理甘地夫人開除國大黨黨籍。這種事很少發生，說不定還是從中共中央將國家主席劉少奇開除黨籍這件事中得到了靈感。」

權力的一場爭奪遊戲，而這一場遊戲注定落得失敗的境地，而賠上失敗賭注的，只有低下階層的人民。而金庸作為《明報》的創始人，而《明報》的定位已經轉變，金庸作為新聞工作者，自然替低下階層的人民感到憂心，故此金庸透過社評表達文化大革命對人民造成的不滿。

第五章：《鹿鼎記》的政治隱喻

《鹿鼎記》是金庸最後一部武俠小說作品，⁶⁰它的風格與金庸脫離傳統武俠小說的書寫方程式。《鹿鼎記》的主角是韋小寶，韋小寶不學無術，也無絕世武功，只是一名「市井之徒」。金庸指出曾有不少讀者寫信，詢問《鹿鼎記》是否他人代筆之作，金庸表示：「《鹿鼎記》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複自己的風格與形式，要盡可能地嘗試一些新的創造。」⁶¹《鹿鼎記》成為金庸的「實驗之作」，對武俠小說的框架，作出新的嘗試和定義，這也是《鹿鼎記》與金庸舊有武俠小說與別不同的原因。因此，我們不能忽視《鹿鼎記》在人物形象、情節內容的取材方面，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金庸認為：「小說反映社會，現實社會中並沒有完美的人。」⁶²雖然金庸只說是反映社會沒有完美的人，其實這是為韋小寶的人品作護航，⁶³但金庸也明確指出「小說反映社會」，所以，《鹿鼎記》能夠反映當時金庸所處於的政治環境氛圍中。而在本篇論文中〈小說的政治隱喻說明〉中，過往也有不少學者，將文化大革命與《鹿鼎記》作對讀，認為《鹿鼎記》有影射文化大革命的內容。

在《鹿鼎記》中，最富有直接政治隱喻的人物是洪安通，洪安通是神龍教教主。小說中描述神龍教行使了皇帝式的朝廷禮儀，教眾須按身分、地位、男女站立，排場之大，使長期身處皇宮，與康熙相處的韋小寶也不禁暗罵：「他媽的，

⁶⁰ 1969年10月24日開始在《明報》連載，至1972年9月23日完成連載，歷時兩年十一個月。

⁶¹ 金庸，《鹿鼎記》，頁1959。

⁶² 金庸，《鹿鼎記》，頁1960。

⁶³ 由於很多學者、讀者對韋小寶這個角色有不同的評價，金庸及後寫了一篇〈韋小寶這家伙！〉，為韋小寶作平反，認為韋小寶最值得學習的是能夠適應環境生存和講義氣。詳文收錄於倪匡，《三看金庸小說》（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頁173-192。

好大架子，皇帝上朝麼？」⁶⁴金庸在此透過韋小寶對洪安通的行為，表示其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接見紅衛兵的不滿。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發表公開信，表示熱烈支持紅衛兵。隨後，江青和林彪等激進派從中煽動，策劃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前來北京朝聖。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雲集，總人數高達 1,100 餘萬，毛澤東需要分八次先後接見。⁶⁵將洪安通自封為帝式的宮廷禮儀的排場，與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朝聖毛澤東的事情來看，金庸是不滿毛澤東這類勞民傷財的舉動。因為金庸曾多次在社評中表達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項破壞社會、人民安定和平的運動，例如金庸在社評〈中共和南斯拉夫修好〉提到：「中共和蘇聯的鬥爭，既不是民族主義的衝突，也不是出於思想上的矛盾，根本便是雙方領導層的權力鬥爭。」⁶⁶可見，金庸認為中國共產黨會借助與外國造成矛盾衝突，從而維持個人的在黨內的權力，這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漠視人民的利益。其次，在〈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中提到：「……應當是促進全人類的福利，增加人類的幸福，那主要是和平與善意，是科學、技術、和文藝上的貢獻，是使人類生活得更自由、更快樂，而決不是增加更多的鬥爭和災難，更多的貧困、辛勞和痛苦。……如果和平與繁榮是「偉大」，那麼七十年代將是很偉大的，只不過這種偉大恐怕免不了有一點兒沉悶和平淡，未必是中共所期待的那種『革命大風暴』的偉大。」⁶⁷金庸這篇社評是在 1970 年 1 月 2 日發表，是對 1970 年的一個新年新的展望，而金庸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時候，包括推行的「大躍進」政策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使人民活在苦難之中，而且失去自由，更為了個人的權力，利用人民對其異己者進行批鬥。金庸認為種種的權力鬥爭，最大犧牲者是人民，而中國人民最需要的是穩定的生活，而且金庸認為掌權者最「偉大」的能力，是讓人民生活過得平安，讓科學、技術、和文藝得以發展，「偉大」並不是透過「動員力」顯示自己的權力，而毛澤東為了顯示個人的權力，江青和林彪則在旁大力附和，使正是社會的

明報

⁶⁴ 金庸，《鹿鼎記》，《明報》（香港），1970 年 11 月 2 日。

⁶⁵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頁 809。

⁶⁶ 〈中共和南斯拉夫修好〉，第 1 版。

⁶⁷ 〈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第 1 版。

勞動力的大量的紅衛兵，放棄國家生產，舉國前往北京天安門朝聖，是一項不智的舉動，而這舉動，只是為了顯示毛澤東一己的權力，用以鞏固個人在黨內的權力。金庸對紅衛兵「朝聖」毛澤東的行為，感到不滿，並沒有在社評中直接指罵，而是在小說中，描述韋小寶看見神龍教洪安通出場時，和教眾對洪安通的「膜拜」，與紅衛兵「朝聖」毛澤東作出一個對照，更借韋小寶罵出一句髒話「他媽的」表示不滿，因為只有韋小寶有這個「本事」，過往的英雄豪俠，倘若罵髒話是與身分有所違背。故此金庸將在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先選取角色和情節，再利用「流氓」韋小寶作出宣洩。

其次，神龍教教眾認為對教主的諛詞頌歌能夠使自己武功更加高強，⁶⁸故此在對敵之時，或者叩拜洪安通之時，都會高叫一些口號，⁶⁹而這些口號除了是對神龍教的信仰，對洪安通的奉承外，更是一種個人崇拜。而金庸曾在社評〈一代巨人 羅素逝世〉⁷⁰及〈羅素反對崇拜領袖〉⁷¹表明反對崇拜領袖。由於當時羅素逝世，金庸撰寫社評表達惋惜之情，更寫出羅素對哲學界的貢獻，並且表明立場認同羅素的哲學思想。翌日，金庸再發表一篇社評，解釋羅素的哲學主張，並且認為羅素反對崇拜領袖的主張，即是金庸反對崇拜權威，他認為國家領袖往往自以為是，自私自利，利用人民爭取個人，或所屬的團體的權力和利益。金庸描寫小說的時候，使神龍教教眾認為對教主的諛詞頌歌是增加武功功力，能夠勇戰殺敵，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也有持《毛主席語錄》，認為毛澤東的說話是真理：「紅衛兵熱淚盈眶注視毛澤東，揮舞著《毛主席語錄》，接受毛澤東檢閱，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推到了巔峰。」⁷²從金庸的社評可見，他是明確反對個人崇拜，

⁶⁸ 金庸，《鹿鼎記》，《明報》（香港），1970年8月18日。

⁶⁹ 例如：「洪教主萬年不老，永享仙福，壽與天齊」、「洪教主神通廣大，我教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無堅不摧，無敵不破。敵人望鬼披靡，逃之夭夭。」

⁷⁰ 〈一代巨人 羅素逝世〉，《明報》（香港），1970年2月4日，第1版。節錄內文：「為了推升他的深知灼見，俾普遍為世人所知，我們今後將繼續不斷譯介這位哲人的各種著作。」

⁷¹ 〈羅素反對崇拜領袖〉，《明報》（香港），1970年2月5日，第1版。節錄內文：「他最反對崇拜權威，認為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的，只能在不斷的修正中求得最接近的真理，不可能有絕對不錯的真理。從這個根本的觀念出發，他反對國家濫用權力，壓制人民。因為國家領袖往往自以為是，自私自利，自稱「我便是真理」，其實只是在驅使人民為自己一個小集團的利益服務。」

⁷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頁809。

因為這是濫用權力，壓制人民，紅衛兵信奉《毛主席語錄》，拋棄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像小說中，教眾的口號成為殺人的武器，而《毛主席語錄》及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是破壞國家和人民安定的武器。

另外，在韋小寶帶兵炮轟神龍島，直搗神龍教，倖存者開始遭到洪安通的「清算」，如白龍使張志靈喊冤：「屬下跟隨教主二十年，凡事勇往直前。我為本教拼命之時，這些小娃娃都還沒生在上。為甚麼他們才對教主忠心，反說我們老兄弟不忠心？」⁷³從張志靈的對話中，可見洪安通對舊有的下屬作出不信任及殺害，而捧上新一代的下屬。在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通過鬥垮、批判、改造，以求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個單位平均有百分之七至十的黨員受到處分或被掛起來，及後，毛澤東指定繼承人的林彪，因未獲得毛澤東的明確同意，便聯合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提議恢復設置國家主席，並暗中派遣親信發言響應，在毛澤東知道後，林彪深怕遭到清算，而「叛逃」到蘇聯。⁷⁴由此可見，洪安通「清算」教內的掌權人物，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內清算共產黨內的黨員，能夠作一個對應閱讀。而金庸在社評〈全能天才 不培養了〉⁷⁵中，表示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是依照「新當權派」的路線，反對舊有極左派衝動狂熱的激烈路線。而且小說中，金庸也按著中國共產黨的「舊換新」政策，寫出小說洪安通清算舊有下屬。其次，金庸在社評中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清算的運動，對四個階級成員「大整而特整」⁷⁶，而且是造成對原本擁護毛澤東的群眾造成離心力⁷⁷，金庸將其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見，即清算行為以及四個階級開始捨棄毛澤東的事件，影射在教主洪安通殺害教眾和教眾離棄教主洪安通上。

金庸在韋小寶身上，也寄予政治隱喻。金庸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破壞了中國的

⁷³ 金庸，《鹿鼎記》，《明報》（香港），1970年11月6日。

⁷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頁827-840。

⁷⁵ 〈全能天才 不培養了〉，《明報》（香港），1970年3月19日，第1版。節錄內文：「中共在經濟、外交、內政各方面採取比較穩健的政策，我們曾說這一來是『新當權派』得勢，壓倒了極左派衝動狂熱的激烈路線……」

⁷⁶ 〈毛澤東的三件法寶〉，第1版。

⁷⁷ 〈毛澤東的一篇重要演講〉，《明報》（香港），1970年4月21日，第1版。節錄內文：「我們曾在許多篇社評中指出，中共二十年來經過無數內部鬥爭和運動，本來擁護他們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逐步離心，甚至嫡系的幹部和軍人，也大批大批的受到整肅。」

文化、藝術，由於文化大革命主張「破四舊」，包括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而金庸在社評〈文化藝術 照破不誤〉⁷⁸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直在破壞中國的文化藝術，這是中國寶貴的遺產和傳統，而中國共產黨卻沒有重建的打算。在小說中，韋小寶與陸先生的一節中，韋小寶塗污陸先生的書畫，陸先生暗地裡說：「可憐這些書畫都是名家精品，價值不菲，今日遭劫，盡毀於這小頑童之手。」⁷⁹韋小寶在小說中，位高權重，雖然目不識丁，卻因為是皇帝身邊的紅人，在外胡作非為也不會遭到責備，所以大肆破壞珍貴的文物，也不會感到可惜，而知識分子，卻對此行為感到痛心疾首。金庸透過不學無術的韋小寶，影射中國共產黨進行文化大革命，大肆破壞儒家文物或其他文化藝術的一面。另外，金庸在這個情節也寫出中國共產黨進行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鄙視，例如就清華大學而言，學校被認為定是由資產階級控制，全部 6,000 教職員中，有 2,000 人遭到批判，178 人被定為反革命分子。⁸⁰可見金庸將文化大革命對文化、藝術的破壞，利用韋小寶的「任性妄為」，在小說中「再一次」大肆鄙視知識分子和不恥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

金庸對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不滿，因為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人民生活在苦難之中，金庸希望文化大革命盡早完結，而這個政治寄望，也暗藏在小說中。在小說的後段，天地會和康熙都要求韋小寶剷除對方，而韋小寶在雙方的環境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面對兩難的抉擇，韋小寶在心中叫道：「他奶奶的，老子不幹了！甚麼都不幹了！」⁸¹當「流氓」韋小寶，面對權利，卻是選擇了義氣，一不殺害康熙，二不剿滅天地會。韋小寶這個選擇是需要有無比的勇氣，因為他可能同時面對兩方面的逼害，而韋小寶卻「捨權取義」，放棄權力和地位，返回楊州過平

⁷⁸ 〈文化藝術 照破不誤〉，第 1 版。節錄內文：「可是在文化藝術方面，中共一點也沒有讓步。不論是文學、戲曲、電影、美術，音樂那一方面，已經摧毀了我國寶貴的遺產和傳統，沒有絲毫重建。」

⁷⁹ 金庸，《鹿鼎記》，《明報》（香港），1970 年 10 月 29 日。

⁸⁰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頁 824。

⁸¹ 金庸，《鹿鼎記》，頁 1920。

凡生活。金庸在社評〈周恩來，願你健康！〉⁸²中，指出極大多數人民希望平安定的生活，而且物質生活能夠提高，不要再發生殘酷的鬥爭，這一個同時是金庸的願望，而達成這個願望，是希望毛澤東能夠與韋小寶一樣，能夠放棄權力、地位，以人民的生活為首要的大前提，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

從上述的分析中，《鹿鼎記》的政治隱喻能夠從兩方面來看。首先，金庸「邊寫社評，邊寫小說」的經歷，使他的社評和小說有互相影響的作用，而且「小說反映社會」，金庸對當時文化大革命的不滿，除了在社評中表達，更隱喻在小說中，透過小說的人物和情節抒發，將現實的政治環境作為書寫小說內容的材料，使讀者能夠從小說中感受金庸的政治意見。其次，金庸創新的武俠小說寫作手法，是便利諷刺和滲入寓意，由於韋小寶與過往的英雄豪俠大不相同，一些粗俗的語言和行為能夠透過韋小寶表達，因為無法從正義凜然的郭靖口中吐出一句「他奶奶的」，而韋小寶的「任性」則能夠讓金庸靈活使用，借用韋小寶的性格，宣洩金庸對政治的不滿。當然，《鹿鼎記》不只是諷刺文化大革命的小說，從文學賞析角度，《鹿鼎記》無疑是武俠小說的創新，然而，當讀者配合金庸的社評，與當時政治的環境，再閱讀《鹿鼎記》，便能感受金庸在《鹿鼎記》中的政治隱喻。

第六章：結論

本篇論文旨在研究金庸《鹿鼎記》小說的政治隱喻，而小說卻不能作為獨立分析的個體，故此透過《鹿鼎記》的載體——《明報》，先分析金庸與《明報》的關係，以及《鹿鼎記》與《明報》的關係，繼而透過金庸在《明報》撰寫的社評，得出金庸的政治觀點、立場，始能進一步剖析《鹿鼎記》的政治隱喻。

雖然金庸在《鹿鼎記》的後記中表明，並沒有將《鹿鼎記》改版，然而本篇論文選擇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採用第一手資料的文本，由於《明報》初時保存失當，有些日期的社評或小說無法尋獲，故此本篇論文引用的社評及小說，大多都是選取第一手資料作研究文本。本篇論文將 1969 年 10 月 24 日至 1972 年 9 月

⁸² 〈周恩來，願你健康！〉，第 1 版。

23 日的社評和《鹿鼎記》，進行並排式的研究和對讀，研究顯示金庸並非即時將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不滿，立即融入在小說的情節中。由於《鹿鼎記》開始連載之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三年，而金庸早在 1965 年 11 月的社評中，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關注，所以《鹿鼎記》小說是無法「追上」金庸表達文化大革命或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見。有見及此，本篇論文只能先分析金庸的政治意見，再從小說文本中，找尋隱喻政治意見的線索，再配對社評作出闡釋。

由於《明報》的編輯新聞立場改變，以致金庸在《明報》中設立不少專欄，供其或其他讀者致函表達政治意見，例如〈鄉土〉、〈自由談〉等。金庸對政治的意見和立場能夠直接且明顯的從〈社評〉中表達，而在小說中，只能採取影射、暗喻、暗諷的方式表達其個人的政治的意見和立場。

本篇論文的貢獻在於通過第一手資料，社評和小說的相互對讀，發掘金庸完整的政治價值觀念。金庸在《鹿鼎記》的創新，顯示小說除了是文學作品，消閒的性質，更是能夠賦予監察社會、反映社會的功效。《鹿鼎記》使小說的功能更能彰顯，不止於「通俗文學」，更是「政治文學」。

此文選題有價值，學界歷來關注金庸小說《鹿鼎記》中的政治隱喻，研究不少，但能與金庸在《明報》發表的社評及政論並讀，掙折其中的含意者較少。本文能從文本回讀角度出發，考據一手資料，立論清晰紮實，但亦存几方面值得再改進。

① 論文架構：是否可結合第 1 及第 5 章小說一同分析，使讀者重心設在政治隱喻身上

② 註腳：有數處引用《明報》材料欠日期。

③ 文句：略欠通順

參考資料

報刊：

1. 《明報》(香港)，1969年10月24日至1972年9月23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

書目：

1.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香港：名窗出版社，1989。
2. 林麗君編輯，《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香港：明河社，2000。
3. 金庸，《鹿鼎記》。廣州：廣州出版社，2007。
4. 金庸著，江堤、楊暈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
5. 倪匡，《三看金庸小說》。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
6. 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1。
7.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
8.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10. 陳墨，《文學金庸》。臺北：雲龍出版社，1997。
11. 傅國涌，《金庸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
12. 潘國森，《話說金庸》。香港：名窗出版社，1998。
13. 潘國森，《雜論金庸》。香港：名窗出版社，1995。
14. 羅立群，《談劍錄》。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15.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1999。

論文：

1. 咎馨，〈月明林下美人來——淺談金庸小說中的女性世界〉，《山東文學》，期12，2007年，頁39-41。
2. 丁莉麗，〈金庸的悖論：傳統男權尺度與現代女性觀〉，《浙江學刊》，期5，1997年，頁86-90。
3. 陳素雯，〈金庸武俠小說連載本(1962-1972)與文化大革命〉。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論文，2007年。
4. 盧乃鳳，〈金庸《鹿鼎記》新舊版本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9年。

Leung_Chi_Wang_14040189D_Capstone

ORIGINALITY REPORT

11%

SIMILARITY INDEX

10%

INTERNET SOURCES

0%

PUBLICATIONS

4%

STUDENT PAPERS

PRIMARY SOURCES

1

chinese.nchu.edu.tw

Internet Source

2%

2

commons.ln.edu.hk

Internet Source

1%

3

www.pbegolf.com

Internet Source

1%

4

Submitted to Li Po Chun United World
College

Student Paper

<1%

5

etd.lib.nsysu.edu.tw

Internet Source

<1%

6

wenxueba.net

Internet Source

<1%

7

Submitted to iGroup

Student Paper

<1%

8

book.jsdtdz.com

Internet Source

<1%

9

nccur.lib.nccu.edu.tw

Internet Source

<1%

Submitted to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10 University
Student Paper

<1 %

11 www.ylib.com
Internet Source

<1 %

12 www.bookcool.com
Internet Source

<1 %

13 www.mh.sinica.edu.tw
Internet Source

<1 %

14 www.wengewang.org
Internet Source

<1 %

15 semiotics.net.cn
Internet Source

<1 %

16 literature.net.cn
Internet Source

<1 %

17 www.tdblyxh.com
Internet Source

<1 %

18 ccc554.hahahaaa.info
Internet Source

<1 %

19 zhwxwh.com
Internet Source

<1 %

20 Submitted to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 Paper

<1 %

21 www.ebook.com.tw
Internet Source

<1 %

22 www.jyjh.net.cn

Internet Source

<1 %

23

wap.sshd8.com

Internet Source

<1 %

24

www.jinyongbbs.com

Internet Source

<1 %

25

www.hiyyou.com

Internet Source

<1 %

26

www.1a3.cn

Internet Source

<1 %

27

www.67ac.cn

Internet Source

<1 %

28

www.zhashi.net

Internet Source

<1 %

29

fedetd.mis.nsysu.edu.tw

Internet Source

<1 %

30

longchuanxiaolv.blog.163.com

Internet Source

<1 %

31

www.lishila.com

Internet Source

<1 %

32

m.51travel.org

Internet Source

<1 %

33

www.68061555.com

Internet Source

<1 %

34

etds.lib.tku.edu.tw

Internet Source

<1 %

35

Submitted to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 Paper

<1 %

36

baike.baidu.com
Internet Source

<1 %

37

vicsforum.blogspot.com
Internet Source

<1 %

38

www.fgu.edu.tw
Internet Source

<1 %

39

book.55www.com
Internet Source

<1 %

40

zuoye.baidu.com
Internet Source

<1 %

41

www.jyjh.com.cn
Internet Source

<1 %

EXCLUDE QUOTES OFF

EXCLUDE MATCHES OFF

EXCLUDE
BIBLIOGRAPHY OFF